

李庚辰杂文选

梁

世

集



探世集

李庚辰杂文选

北岳文艺出版社

探 世 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字数: 194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380册

ISBN 7—5378—0053—7/I·51

书号: 10397·239 定价: 1.70 元

目 录

胸正则目不邪，语中的……………(1)

——读李庚辰同志杂文集《探世集》的感想(代序)

知恶必去……………(7)

从陈香梅的批评说起……………(10)

周司业与范学道……………(12)

“酌情处理”种种……………(15)

羞羞势利眼……………(18)

治治“过敏症”……………(21)

有感于卡玛罢宴……………(24)

不合原则的“原则”……………(26)

某种“调查”的调查……………(28)

卖权的勾当……………(31)

谨防污染孩子的心灵……………(33)

勿损“长城”……………(35)

“充角色”别议……………(37)

“严肃处理”要严肃……………(39)

“泰山老母”不雨粮……………(42)

忘记不得……………(44)

“考试”	(46)
谨防“捧杀”	(48)
管住自己的嘴巴	(50)
“检查团”也应受检查	(53)
学会透视法	(56)
官僚主义与“踢皮球”	(58)
将进酒，杯宜停	(60)
浅析“清静官”	(65)
仲喜相马	(68)
话说“公司”的名与实	(69)
从“幸福坛”想到的	(71)
“考验”谁？	(73)
文凭与爱情	(75)
“马后炮”还是“马前炮”？	(77)
勿求虚名以自娱	(80)
说“较真儿”	(82)
“拒敢私怀一己忧”	(84)
假话的实效	(86)
谦卑近于伟大	(89)
通民情与闻己过	(91)
真实的力量	(93)
孟子的用人观	(95)
做官的“诀窍”	(98)
听听“老人言”	(101)
“后台”与“前台”及其它	(103)

有志者事竟成·····	(107)
鸡蛋与人才·····	(109)
需要“伯乐加赵普”·····	(112)
做伯乐也不易·····	(114)
“知人善任”一说·····	(117)
共产党员的位置·····	(120)
巴子墓·岳王坟及其它·····	(123)
何必辨襄阳南阳·····	(126)
读书方法三题·····	(129)
“开卷”未必都“有益”·····	(132)
学而不可无友·····	(134)
学而不思则罔·····	(136)
嫉妒之心不可有·····	(138)
“从心所欲”与“不逾矩”·····	(140)
对付“闲言碎语”一法·····	(143)
“观棋”一语·····	(145)
文与人·····	(147)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149)
“动力”研究·····	(154)
抓狼、捉猴与打仗·····	(157)
发现爱人的缺点怎么办？·····	(159)
“人和”与“心和”·····	(163)
“慎独”与“慎微”·····	(165)
学学鲁迅“喝酸酒”·····	(167)
戒奢·····	(169)

“睡觉”小议·····	(172)
冷热之间·····	(174)
“摩擦学”与团结·····	(176)
不可书者不可为·····	(179)
“王莽谦恭未篡时”·····	(181)
听其言 观其行·····	(183)
“悬鉴”说·····	(185)
“垫害人”与小报告·····	(188)
知世说·····	(190)
“转胎灵”及其它·····	(195)
说胆·····	(197)
“卖糖的阿姨不卖糖”·····	(199)
“小算盘”与“大算盘”·····	(201)
“罚务速而后有怨”·····	(204)
杂谈“利弊”·····	(206)
“刑期变学期”质疑·····	(208)
钱字两支戈·····	(210)
可贵的“主人翁”精神·····	(213)
为祖国而骄傲·····	(215)
营业员的“笑”·····	(218)
鲜花·汗水·眼泪·····	(220)
祖国高于一切·····	(222)
“推动”与“带动”·····	(224)
做共产主义大厦的建设者·····	(226)

“和大家一样”	(229)
无功便是过	(231)
马谡的悲剧	(234)
如何对待“双突出”人物	(236)
用行动建立威信	(238)
“挑担子”与“背包袱”	(241)
杂文不是无情物	(243)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	(246)
心如赤子的杂文家	(248)
也谈科学小品与杂文的区别	(251)
“穿靴戴帽”的功能	(257)
论“红了眼看”	(260)
“拿来”之前及之后	(263)
“权”与“利”辨诬	(265)
会算帐方知得失	(267)
好的赚钱法	(270)
该这样讲理想	(272)
萌芽	(274)
“快速构思法”与“文坛登龙术”	(277)
姑娘社交漫议	(279)
“掐尖儿”浅说	(281)
“奇装异服”辨	(283)

后记.....	(286)
---------	-------

胸正则目不邪，语中的

——读李庚辰同志杂文集《探世集》的感想（代序）

宋 振 庭

我们现在叫杂文的这种文体，实际上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说得广泛一些，孔老夫子的《论语》也得叫杂文，因为他天上、地下、礼、乐、射、御、书、数都讲，杂得很。难怪在山东曲阜孔子讨论会上，有人算了算说，这位孔先生有二十几个“家”的头衔，诸如哲学家，政治家，音乐家，体育家，军事家，美术家，还有说他是个烹饪家，讲过“食不厌精”。所以鲁迅先生讽刺那些有考据癖的人给此公作了个医案，说他有胃下垂，慢性胃炎，病因是坐的车不好，而路又不平，所以他吃饭必“不撤姜食”。至于是美术家那当然更有据，如“巧目盼兮”，“绘事后素”的理论是蛮高明的。这样说来，《左传》等先秦诸子之书也得算杂文，更不用论“小说家言”的“小说”了（按其原意说的，不是现在的小说）。到了晋及南北朝的《说苑》、《新序》、《世说新语》等亦是如此，更不要说唐宋大兴古文运动的八大家了，那其中的杂文就更多，如韩愈的《原道》、《师说》、《讳辨》，不是杂文是什么？柳宗元的《三戒》更是杂文的名篇。

但若这样说，大有给杂文抢生意，占地盘，争正统之嫌。因为上边说的这些文章，以后分了等级，有的被捧起来

了。捧得最吓人的叫经，如孔、孟的杂文就被奉上了神灵的宝座，再没有人敢叫那些文章为杂文了。韩愈有争道统之功，又配享孔庙，而且文起八代之衰，那谁还敢管他的文章叫杂文！就这样，今天升一批，明天升一批，升来升去，就剩下没有出息的写“小杂文”的人了，就管他们叫杂家。所以杂文之难登大雅之堂，便早就命里注定了。

其实，以现代中国的文章两大家——毛泽东和鲁迅说，他们的文章杂文就很不少。鲁迅先生不用说了，他是现代中国杂文的祖师爷，为了此文体，先生一生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言之令人心酸！毛泽东同志呢，他那些短篇政论杂文，也是千古雄文。别的不说，“老三篇”算不算？几评白皮书算不算？我这么说，大有不敬之嫌。因为为了背诵“老三篇”，我挨过造反英雄的痛骂和痛打，所以记得真切。其实，即使让我背时，我仍是当作杂文的范文来背的。不过心里这么想，我又不说出来，那些陈阿大式的造反英雄，当时还未学会诛心之法，所以我就这样瞒哄过关。

我想，杂文就是杂文，第一它是文，第二他又杂，具备此二点者，就可称之为杂文。但它也得有个界限，第一，可能一般的要短小一些，多半又可叫短文；第二，写得活泼一些，口语化一些，因此又叫随笔、随记、随语等等；第三，和公文、呈报、书、誓、典、诰、谟、训、祭文等等有区别。所以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虽不长，却不能叫作杂文。但这些都是从外表形式说的。

就内容说，我想（只能是“我想”，因此处需要大家商量）杂文可不可以分如下几类：一、政论体杂文；二、哲理性杂文；三、文论式文艺批评性杂文；四、社会时事性杂文；

五、抒情随笔性散文类杂文；六、格言、谚语、寓言、座右铭式的杂文；七、其它。所以还要有一个“其它”，这是一个未知数，不尽数，因为天晓得还有多少种可以列入杂文的新户口。

以中国现在被人瞩目的杂文老手来说，如黄裳、唐弢同志的杂文，文学性较强，文字考究，我想学也学不来，这是我底子薄，练笔不到家的缘故。赵超构、徐铸成几位老报人的时事、社会新闻性杂文，敏锐及时，文字简练，这个功夫，是硬功夫，小可难达此境。秦牧同志的《艺海拾贝》等杂文，文艺性，艺术论，知识面，语言新等方面也令人心服。当然，三家村的诸公更是我们时代以身殉文的大家，他们的杂文就更杂了，但谈史、说文、议事、寓言，万象纷纭，归到底都是救正时弊的为多，仍是当年鲁老夫子的笔法。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杂文有中兴之势，这是尽人可见的。但今天的杂文，也有今天杂文的长短。有繁荣昌盛的主流一面，也有值得纠正和该注意、警惕的一面。对于后者，我想主要是看社会效果好坏。比如对我们的生活、祖国、人格、党性、五讲四美、社会风气，特别是对青年，影响好的就是好杂文，反之，就值得注意和吸取教训。

写到这里，就出来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杂文叫人轻视，甚至有反感。除了读者方面，有人有成见这一面原因之外，还得从杂文和杂文作者自身找找原因。我想所以有这样的文和人，道理和表现虽很多，但归根到底有一个致命的根由，就是动机不纯，存心不正，有邪思邪念。胸不正则眸子眊焉！这不正是以文谋私，私心太重，轻薄为文而不是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吗？

天下事，都是成双成对，无独有偶的。前边，我说过从《论语》、《左传》到唐宋八大家，到毛主席、鲁迅，这是杂文的正脉。但杂文从来也有谬种流传，给坏人坏事帮过大忙的。造谣诬陷，罗织人罪，揭人隐私，吹，拍，捧，蒙骗，拉拉打打，甚至以流言杀人也都是杂文中世代相沿的一派。到了“四人帮”，姚文痞的年头，那种大字报，“砸烂狗头”的大批判，你也得惊服那杂文的气势；“批邓”时，那个劲头，可也真叫颠倒黑白，其威风杀气，弄得个天昏地暗。今天，有的杂文，还有没有一点当年大批判的遗风？有没有一点流氓气息？特别是为文之念头，存心就不良的，恐怕也不能说没有。所以，我曾向杂文作者呼吁过，写过关于杂文的陈情表，说杂文不好写，容易犯错误，对杂文的要求应该严格，但得责之以道，不可过于求全。可是，对造反大字报一类杂文，我则和鲁迅先生当年痛斥警察先生王平陵的文章一样说：“你的杂文，除了吓唬洋车夫以外”就是狗屎一堆。当然，“狗屎一堆”不是先生的话，先生不会说这话，这是我的许褚张飞式的语气。

本来是为李庚辰同志的杂文集写点前言，为什么引申开来，讲了这么长的一个楔子呢？因为我有个想头，就是，把这些话先说了，再谈庚辰的杂文集就好说话了。

我和庚辰并不很熟，他也未请我吃烤鸭。他是一个穿军装的杂文作家，这些年写得十分勤奋，文字之涉猎面极宽广细微，常常在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据说也是人到中年。这次是他把文稿寄给我，想让我说几句话的。交待清这一点有好处，因为请人作序，尤其是请名人作序是上了漫画的。

对此我感到心安，理由有二：一是未吃他的烤鸭；二是我并非名人，虽也写写杂文，但好文章不多，“酸酒”不少（庚辰文中有这么一篇）。

此集除个别篇外，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共分三大类。

一：主要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议论。内容涉及形势任务、精神道德、党风党纪、世界观、方法论等比较广泛的方面。这部分的特点是围绕现实斗争生活，紧密联系实际，有的放矢，有感而发。文虽短但所言皆有物，不尚空谈空论。

二：主要是思想修养，恋爱婚姻和爱国主义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思想修养文章都是根据青年中的实际问题，选取有典型意义者，就合适由头加以议论，于娓娓而谈中宣传马列主义，帮助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

恋爱婚姻方面，他原写过几本书，对这方面的问题做过一些研究，这里本着多端寡要的精神辑入了几篇。

有关爱国主义的几篇系漫谈写法，虽不似典型意义上的杂文，但充溢着爱国激情，而且都是针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不爱国的错误言行而言，很有教育意义。

三：主要是关于文艺问题的议论。

我觉得，庚辰之文，好就好在：

第一、立场对头，正视现实，旗帜鲜明，注意分寸。对革命的、新生的事物热情褒扬讴歌；对错误的、腐朽的东西，敢于痛下针砭；对林彪、“四人帮”等国内外敌人则嘻笑怒骂，勇于战斗。

第二、涉及生活面宽广，大至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内政、外交，小至恋爱婚姻、吃喝玩乐，都有所触及。

第三、文风朴实，不事雕琢，多言之有物。

容我直言：就上面所说的当代的一些杂文大家的范文而言，庚辰的文章，现在的火候还不能说到了，还正在前进中，但我读了他的《探世集》后，却觉得庚辰的文章很有特色。

特别让我惊叹的是，庚辰读书力求扩大知识面的心情，几乎是每文必见。本来，杂文就得“有点文学”，这是河北省委高扬书记的话。我不是攀亲戚，因为高扬同志平日就对我说过这句名言。另一方面，就得给人以知识。在这方面说，杂文之为物难言也夫哉！可以说，其作者的心灵的海洋有多大，就有多么大的杂文，大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鲁迅才有的那样的杂文。这条路是无尽无休的。但苍天不负有心人，只要存心正，不装，不偷，不骗，不投机取巧，努力学习，是可以达到的。庚辰的文采与知识，来日当更可大见新采。

知 恶 必 去

不正之风这种东西，虽然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有的人却又觉得它更象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所以，尽管大家都在喊纠正不正之风，实际行动却是大为不同的：很多人的确是言行一致，说纠正，就纠正，在实行上见分晓；有的人却是说一套，做一套，“纠正不正之风”喊得震天价响，一遇到具体问题，便把嘴上喊的忘到九霄云外，不正之风依然故我。这样，给人的印象就是“纠而不正，糊弄群众”。这种“光说不做”的假把式，不要说与“只做不说”或“少说多做”相差甚远，就连和“不做不说”比，也是等而下之的。

“光说不做”的人大概是为了眼前利。儿子想当官，老婆想发财，媳妇想换个好工作，都得靠老头子来办；而老头子又是“教育人的人”，台上报告，台下巡视，念的就是“党风经”，如果“做”得太认真，上述各类“好事”就一样也办不成。而不“说”又违背职守，于是来个说归说，做归做。“说”是为了应付外边，“做”是为了照顾内边，“说”者人皆闻之，“做”者几人得见？此亦可谓“两条腿走路”，鸡与熊掌兼得，何乐而不为？

不过，实际生活中却总少不了一个“然而”。这里的

“然而”便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眼前利”有时也会招来“终生憾”以至“终生患”、“终生怨”。闲暇翻书，随手就翻到了现成的例证：春秋时有个郭国，其头头郭公，为小国之君，执政不久，就跨台了。齐桓公过郭氏之墟，问郭国父老：“郭何以亡？”对曰：“善善恶恶。”桓公纳闷了：

“若子之言，何至于亡？”又对曰：“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赞美好的却不实行，憎恶坏的却不除掉，所以亡了。这位郭公大体也是为了眼前利，结果呜呼哀哉了。其实，这种“典型”是很多的，象昏庸无道的晋灵公，每遇大臣谏诤，总说“寡人已知过，今当改之”，其实，言而无信，依然故我；象隋炀帝，“口诵尧舜之言，身为桀纣之行”等等，下场都不美妙。我们在端正党风、打击经济犯罪中揭露的违法犯罪分子，有不少也都是在眼前利上口是而行非，结果陷泥不拔，愈陷愈深，直至从讲台掉进了班房。从某种意义上说，眼前利对某些意志薄弱的人确实非利实害，不是福音，恰是陷阱；不是通向幸福之路的桥梁，却是滑向错误以至滚向罪恶深渊的滑坡！

正因为如此，有见识的人都重视言行一致，都注意从眼前利上约束自己以避祸，唐贞观二年，唐太宗李世民与黄门侍郎王珪闲聊，时“有美人侍侧”。李世民介绍说：这美人是庐江王瑗的姬妾，“瑗杀其夫而纳之”。王珪就问他：王瑗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李答：杀人而取其妻，明摆着不对，还用问吗？可李世民这样说时竟忘记了：王瑗也恰恰是在谋反时被他李世民杀了的，而王瑗的爱妾却又恰恰被他籍没入官，正在陪伴着他。于是，王珪就讲了前面提到的那个